

一首小儿歌，改变了命运，并享誉终身；竟然在今年国庆前夕还上了新民晚报头版头条。

作为老朋友，曾经的“同道”，喜出望外，不禁微信祝贺作者。她的回信，令我感慨：“还记得第一次去开研讨会时的情形，一晃要近50年了。”

记起来了。近50年前，一个秋日的下午，在陕西北路500号原上海市教育局的一个会议室里，我初识金月琴。她，两条长辫，圆脸，胖乎乎

的，笑起来，脸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，好像“窝藏”了很多很多旋律。她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人，19岁；我在上海港第七装卸区当装卸工，20岁。我与她作为青年词曲作者，受到报社的邀请，参加这个带有研讨性质的组稿会。

那个年代文化大饥荒，真是苦了孩子们。没有属于他们的儿歌，就像天下所有鸟儿顿时失声，世界消逝了灵动的春天，黯然失色。

在这个组稿会上，报社主编、儿童文学作家秋生呼吁大家都来创作表现儿童生活与情趣的诗与歌。他同时主编半个月刊，每一期除了编几首儿歌，还在封三发一首儿歌歌曲。刊物的诗歌编辑张福奎先生，原来是一位小学教师。

就在这个组稿会之后不久，有一天，张福奎跑到陕西路54号，走访当时出版社里唯一的音乐编辑汪玲。

张福奎找到汪玲，拿出一份歌稿，请她看看旋律是否有“洋腔洋调”之嫌。

这首歌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

汪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，同学们都去了电影厂、电台、乐团，唯独她钟情于“小儿科”（小儿歌），终年孤守儿童音乐的创作与编辑。汪玲以女性特有的谨慎，接过张福奎送来的这份歌稿，请示文艺组

组长、儿童文学家任大霖。“你是儿童歌曲专家，你定。”大霖把作品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汪玲。

那是1970年夏季的事。两年之后的春夏之交，1972年5月1日上午10点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实况转播北京中山公园游园会，一首童声合唱惊动了全国：“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指引我们向前走。”

这首歌曲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一位音乐编辑在汪玲主编的那份刊物（1970年9月号）上，惊喜发现并毫不犹豫选用了这首作品。因此，央广少儿合唱团成为全国首唱。优秀的歌曲是长翅膀的，央广

播出后的一年之内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歌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。

就像《新民晚报》头条新闻标题所说的那样，金月琴“把对新中国的告白写成一首歌，创作传唱至今50年”。近50年旋律回响海内外，直至最近，多才多艺的普京总统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间隙，在钢琴上奏响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

回首近50年前的往事，我深为金月琴感到庆幸。声乐作品的生命不在于报刊发表，唯有变成歌声，才生起飞的翅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北京不首选演唱，也许这首歌只能在刊物上睡大觉，而且很可能一觉就睡过去了，这也就是《红小兵歌曲》发表一年半毫无声响的原因，当然，如果汪玲没有把这首歌发在刊物上，北京也无从选取；如果任大霖这个组长“外行”随意行使否决权，当时也不可能将这个作品出版；如果张福奎因为难以把握轻易放弃，而不去求教汪玲，那么这首歌就要“胎死腹中”……

以上种种假设只要其中一项成立，这个作品就会“夭折”。所幸的是，这些假设都没有成立，而是一路通达上北京。正是“天地皆同力”。

那个时候，为何还有不止一人冒着可能获“洋腔洋调”大罪的风险护卫这首作品？

汪玲有音乐艺术的较高审美水准。她认为，西方古典名作还不都是“洋腔洋调”，却在五洲四洋久久回响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确有“洋腔洋调”的风格，但风格不应该“获罪”。东西方音乐风格的区别在于，东方重旋律，西方重

节奏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两全其美，既旋律美，又节奏感强；且音域只有9度，演唱的适应面广，儿童特点非常鲜明。央广少儿部的那位音乐编辑，与汪玲对作品的认知“不约而同”，才有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在北京中山公园旁的天安门上快乐首飞，颇有仪式感地完成了作者向往天安门的情怀表达。

这首歌在当时是一种“逆行”，好似岩缝中长出的新花，秘境深处飞出的布谷鸟。

自然，那个年代艺术审美的坚持，不仅要有“识”，更要有“胆”。这种胆识来自于对艺术的忠诚，方能弃个人得失而不顾。无论是张福奎的不耻求教，还是任大霖的终审放权，都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与忠诚。这是金月琴的大幸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相关机构应该尽快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，对第三方平台加大审查、核实力度，以切实保障政府热线、公共服务平台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通信网络的正常运转，保护广大用户的合法权益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我与辛旭光是四十年的朋友了，我们是大学先后辈的同学。他是第一届的大学生，77级，78年入校，随后我也进了同一所师范大学，在校击剑队里相逢，在操场上相识。那时“一片落叶上有七个人在写诗”，我们都在写诗，都将诗刻印成小册子，互相交换，相互切磋。毕业后，他成为川沙县教育局团委书记，后转业于银行，上世纪80年代末被选派到德国的银行研修，回到上海，成为一家银行的支行行长；我呢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，扔了铁饭碗，离开国企，从此东奔西跑，颠簸于途，寻找人生的突破口。我们渐行渐远。最近十年，我们又渐渐地走到了一起。机缘有二：一则我们都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露面，神交多于见面；其二，他组建了一个慈善机构——阳光种子，我的妻儿都是他的拥趸者，他坚持了十年，妻儿追随了十年。这就是老朋友的机缘巧合。

履历不同，为人处世亦不同。假设一个生活场景：夏天再热，他西装革履，玉树临风，文质彬彬，一副君子相；我呢，背心短裤，晚上呢，背心搭在肩膀上，像个乡间大厨，可以很世俗地坐于后弄堂口，迎风而坐，不亦快

节奏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两全其美，既旋律美，又节奏感强；且音域只有9度，演唱的适应面广，儿童特点非常鲜明。央广少儿部的那位音乐编辑，与汪玲对作品的认知“不约而同”，才有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在北京中山公园旁的天安门上快乐首飞，颇有仪式感地完成了作者向往天安门的情怀表达。

这首歌在当时是一种“逆行”，好似岩缝中长出的新花，秘境深处飞出的布谷鸟。

自然，那个年代艺术审美的坚持，不仅要有“识”，更要有“胆”。这种胆识来自于对艺术的忠诚，方能弃个人得失而不顾。无论是张福奎的不耻求教，还是任大霖的终审放权，都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与忠诚。这是金月琴的大幸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要谈一些励志的豪言壮语，比如十年前工资底薪是5000，十年后还是5000，以证明外语不会而无法升职，也表明她为了维护老客户，不离不弃。怎么看不都觉得真实。

兄弟，我不得不刺你一下。作为粗人，我不太喜欢辛旭光的文字；作为都市人，我又不得不常看，除了对老朋友的眷念，还有对这个红尘的关怀。在他这里，你可以看到大都市芸芸众生的音容笑貌，看到白领们的思维习惯、内心独白、心路历程，至少为儿子相媳妇，或有助益，因为我们毕竟离不开这个群体的环绕，因为白领是大都市一个广泛的群体。在辛旭光的《何时聪明》一书里，读者至少可以吸氧，老人可以返老还童，柏拉图可以精神恋爱。我则看到象牙塔里的纯真，还有满腔的善良，一部成人的童话。

旭光，依哪能长不大额啦？还是四十年前校园里的那你，但林荫大道下的纯真少女，早已成了隔壁老王家的婆姨，有了皱褶，有了世故，而你的文章，没有一点皱纹，没有一点世故。

温可铮九十华诞纪念音乐会日前在沪举行。作为一代声乐大家，他一生好学，从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。

1980年，名扬世界的意大利声乐大师基诺·贝基应中央乐团盛邀来北京讲学。这也是改革开放后，继华人第一歌唱家斯义桂来华开设大师班后，中国歌坛的又一盛事。此次为期一月有余的讲学，就在中央乐团的排练厅举办。范围不算很大，学员和旁听者，除了本团合唱团的成员外，仅限于在京的一些音乐院校、文艺团体的专业教师和少数独唱独奏演员。外地自费来此的旁听者，唯有上海的温可铮和他的几位同事。

那时，中央乐团的几代歌唱家刘秉义、罗天婵、吴其辉、杨焕礼、贾宗昌、王世光、田玉斌、阎鸿昌及汪燕燕、李初建等每天轮番登台演唱，接受贝基大师当场点评、讲解、示范、指导，大伙的收获满满。德高望重的温可铮虽已年长，但对学习却不耻下问，听课记笔记最为认真。

有一天，原本要上台演唱的一位学员突然病了，无奈只能临时寻找替代。说来也巧，负责接待大师的一位女同志，是温可铮的同窗。她太了解这位求知若渴的同学了，在得知其跃跃欲试的示唱渴望后，旋即安排。但同去北京的温可铮的几位同事，出于对他的爱护，劝说他不要当众登台，因为万一演唱受到大师的质疑和否定，那后果就难堪了，一世英名可能断送。但从不计较名利得失、一生视歌唱为生命、人生价值和自尊所在的温可铮认为：过去自己一直苦于没机会出国学习，如今世界顶级声乐大师来到身旁，这样的学习机会决不能放过。

那天，颇有大将风度的温可铮演唱了威尔第的歌剧《唐卡洛》中的《非利普的咏叹调》。贝基听完他的演唱后，夸奖了一番，同时指出：现在世界的声乐潮流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，就是唱到高音时要刻意放大声音，由于要求音量大而产生声音的摇晃，你也存在这个毛病……于是，贝基当场就教温可铮如何改正，还多次进行示范。对歌唱技巧极有悟性的温可铮很快领会到大师的要求，问题很快得到改观。

后来，基诺·贝基又应邀来上海音乐学院开班。此次讲学的规模扩大许多，地点设在可容千余人的上音大礼堂，全国一流的歌坛人物几乎悉数到场聆听。

正当踌躇满志的温可铮，向系里要求贝基也能给自己上一堂“课”而无着落时，机缘却来了，原本要上课的四位学员中有一位病倒了，贝基就钦点温可铮替代。

这天，温可铮站在贝基面前，演唱了三首意大利歌剧咏叹调。当他唱完最后一句时，贝基为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，并对他说：“你唱得太好了，上次在北京我给你提的缺点都改正了。高音很漂亮，也不摇晃了。你唱的《萨瓦尔多——戈梅斯》从哪学的？”温可铮回答：“乐谱是一位日本歌唱家送的，但一直没有找到任何歌唱家演唱这首作品的录音磁带。我是按照谱子上每一个表情符号自己练习的。”贝基说：“这首歌是男低音中很难唱的一首作品，但今天你的演唱非常完美，无可挑剔。”

说完，贝基又请温可铮站在他身旁，唱“喂”的哼鸣。温可铮早先从资料中得知，光这个“喂”音，大师就练了十年。当唱完“喂”音后，贝基对他称赞有加，希望在场的听者都能向温可铮学习。

说完，贝基又请温可铮站在他身旁，唱“喂”的哼鸣。温可铮早先从资料中得知，光这个“喂”音，大师就练了十年。当唱完“喂”音后，贝基对他称赞有加，希望在场的听者都能向温可铮学习。

说完，贝基又请温可铮站在他身旁，唱“喂”的哼鸣。温可铮早先从资料中得知，光这个“喂”音，大师就练了十年。当唱完“喂”音后，贝基对他称赞有加，希望在场的听者都能向温可铮学习。

空（外一首）
刘师正
飞机窗户的后面，我能看见虚空。无尽虚空的后面，我能看见月亮。四散月光的后面，我能看见自己的脸。

远方的你
我将乘机三万里
在那里
没有Wi-Fi
没有你
四个季节不交替
春天里
心里想的
都是你
相隔不仅是距离
别哭泣
摘下星辰
送给你

向基诺·贝基大师学习
李定国

近日，有幸作为市民代表参加了黄浦区首次“政府开放日”系列活动首场“看民生”活动。然而，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，差点和这个难得的机会失之交臂。

活动举办前一天的下午，区府工作人员数次打我手机欲与我联系，通知并落实活动的相关事宜。不料我的手机“闷声不响”，而我也全然不知此事。事后才发现，原来区府的电话号码被“三六〇”莫名其妙地标注为“九百四十二人标记过”的“骚扰电话”，于是，我的手机就对该号码一律自动“拦截”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关于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

烁 渊

这首歌曲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一位音乐编辑在汪玲主编的那份刊物（1970年9月号）上，惊喜发现并毫不犹豫选用了这首作品。因此，央广少儿合唱团成为全国首唱。优秀的歌曲是长翅膀的，央广

播出后的一年之内，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歌声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。

就像《新民晚报》头条新闻标题所说的那样，金月琴“把对新中国的告白写成一首歌，创作传唱至今50年”。近50年旋律回响海内外，直至最近，多才多艺的普京总统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间隙，在钢琴上奏响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

回首近50年前的往事，我深为金月琴感到庆幸。声乐作品的生命不在于报刊发表，唯有变成歌声，才生起飞的翅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北京不首选演唱，也许这首歌只能在刊物上睡大觉，而且很可能一觉就睡过去了，这也就是《红小兵歌曲》发表一年半毫无声响的原因，当然，如果汪玲没有把这首歌发在刊物上，北京也无从选取；如果任大霖这个组长“外行”随意行使否决权，当时也不可能将这个作品出版；如果张福奎因为难以把握轻易放弃，而不去求教汪玲，那么这首歌就要“胎死腹中”……

以上种种假设只要其中一项成立，这个作品就会“夭折”。所幸的是，这些假设都没有成立，而是一路通达上北京。正是“天地皆同力”。

那个时候，为何还有不止一人冒着可能获“洋腔洋调”大罪的风险护卫这首作品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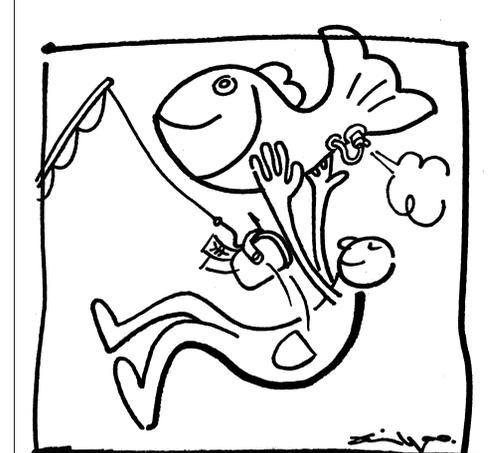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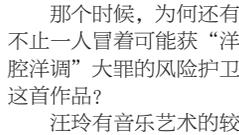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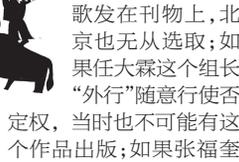
汪玲有音乐艺术的较高审美水准。她认为，西方古典名作还不都是“洋腔洋调”，却在五洲四洋久久回响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确有“洋腔洋调”的风格，但风格不应该“获罪”。东西方音乐风格的区别在于，东方重旋律，西方重

节奏。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两全其美，既旋律美，又节奏感强；且音域只有9度，演唱的适应面广，儿童特点非常鲜明。央广少儿部的那位音乐编辑，与汪玲对作品的认知“不约而同”，才有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在北京中山公园旁的天安门上快乐首飞，颇有仪式感地完成了作者向往天安门的情怀表达。

这首歌在当时是一种“逆行”，好似岩缝中长出的新花，秘境深处飞出的布谷鸟。

自然，那个年代艺术审美的坚持，不仅要有“识”，更要有“胆”。这种胆识来自于对艺术的忠诚，方能弃个人得失而不顾。无论是张福奎的不耻求教，还是任大霖的终审放权，都是一种对艺术的尊重与忠诚。这是金月琴的大幸。

如今，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接到一些诈骗电话、骚扰电话已属家常便饭。很多用户因深受其扰，便使用第三方平台“反骚扰”。但这回用米解决公共事务的热线，被标记了不实信息，导致了部分政府热线和公共服务电话无法切实为人民提供服务。



智慧快餐
郑辛遥
有无无德行骗，无知无畏上当。

想吃地道的火锅，自然首选重庆南山。南山位于重庆南岸区，临江耸立，以火锅名闻遐迩。坐车过江，但见“火锅一条街”上，各色店招琳琅满目，强烈地诱惑着食客，更有无数大红灯笼串串垂挂，将浓浓夜色染成一片火辣。原来“南山火锅”不是一个店名，而是指占了整整一座山的火锅城！沿着梯状的石阶上行，最大的一家店居然在300级台阶之上，可谓“高路入云端”，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店名叫枇杷园。阶梯两侧有许多亭台楼阁，内设火锅桌，据说有999个座位，可容万人同吃火锅。有如此浩大声势，南山就当仁不让成为火锅山了。重庆有4万多家火锅店。一年四季，熙来攘往，食客不绝。即便酷暑，也有游客下了飞机或高铁，直奔南山，一尝心仪的正宗火锅。各家火锅店以自家的特色和绝招吸引顾客，端出的汤料各有千秋。我来时已入初冬，但见远远近近的山道上人头攒动，食客络绎不绝。我们一行人坐进仿古亭里，只见石桌上火锅红汤翻滚，窗外一抹绿荫挂满金黄色的枇杷，

南山火锅鲜辣香

曹国君

鲜、香、麻混杂，合成一个“爽”字进入腹中，十分快意。再看各人，都渐渐满脸潮红，额头沁汗，有几位女士更是移座窗边作深呼吸，借徐徐吹来的山风释放一腔火热。我平时只能吃微辣，在如此浓郁的辣味侵袭下，自感全身的

毛孔乃至血液中都充满了辛辣，爽是爽了，却目光迷离，心跳加快，似乎被辣“醉了”。南山海拔400余米，在此处吃火锅，最妙的是还可欣赏对岸渝中区的七彩夜色。那里，夜色朦胧，星光璀璨，一列地铁从高楼腹部游龙般地穿越，兼有美轮美奂的4座大桥飞架长江，形成一道独特风景。

走出仿古亭时，夜色正浓，只见又一批饕餮之客潮涌般进店来，原来，店里要营业到下半夜呢。我们告别了南山，却都带着最值得纪念、店里又无法禁止带出的东西回上海——一身辣味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七夕会

